

20世纪初生活方式的变革与 启蒙现代性的“性别化”困境

——以凌叔华、庐隐和萧红为中心的考察

姜云飞 张智慧

摘要 五四新文学可说是现代生活方式剧烈变革的伴生之物，但文学研究却较少关注生活方式议题。本文借鉴生活方式“结构—能动”统合理论，从社会性别视角考察凌叔华、庐隐、萧红等女作家作品中再现出来的现代女性生活方式，发现她们触及到启蒙理性在地化过程中的“性别化”困境、“反噬性”危机和“启蒙变味”等问题，揭示了彼时带着文明进步等现代性光环的西化生活方式本身，并未能达成启蒙思想者所期许的呼唤现代主体“人格”的功能，其背后的资本主义消费—享乐意识形态与父权合谋，反而造成炫耀性消费、不平等阶级区隔及主体消弭的悲剧。百年前女作家们的文学想象，已然提出了被当代生活方式理论依旧忽略的性别差异问题，表现出文学回应社会问题的独到敏锐。

关键词 生活方式 启蒙理性 性别化困境 消费意识形态

作者姜云飞，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200433）；张智慧，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浙江杭州310053）。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11-0155-11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引入“科学”“民主”的火种时，在物质层面，也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李大钊说：“吾侪日常生活中之一举一动，几莫能逃其范围，而实际上亦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①胡适清醒看到并承认生活方式会受经济状况、历史习惯等文化惰性的影响，但不认同“折中调和”的态度，而认为应该推行“充分世界化”的理念^②，可见对西方生活方式的认可，也是新文化学者理性纳入世界现代性意识的实践^③。五四新文学可说是现代生活方式剧烈变革的伴生之物，但文学研究却较少关注生活方式议题。近年比较相关的有张莉钩沉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批“女学生”从剪发穿衣到学校寄宿、社会交往等新的生活方式内容，但主要是作为“现代女性写作发生的历史条件”被论及的^④，并未能清晰揭示大变革时代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给女性带来的“具身化”^⑤影响。

①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差异》，参见陈松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7页。

②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参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559页。

③ 张美鸣、陈杰：《现代生活方式与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东岳论丛》2009年第12期。

④ 张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⑤ “具身化”（embodiment），来自海尔斯的观点：“相对于身体，具身化是情境性的，被卷入地点、时间、生理和文化的特性中，这些特性共同构成了规范”。转引自刘希：《话语内外：百年中国文学中的性别再现和主体塑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91—92页。

社会学研究揭示，生活方式理论回答的是“怎样生活”的问题，由生活活动条件、生活活动主体以及生活活动形式三种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①。广义的生活方式涵盖生活的一切面向；狭义的生活方式仅指向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领域^②，如凡勃伦对炫耀性消费生活方式的分析、齐美尔对都市生活方式的分析等都属于狭义生活方式研究领域。主要有两大理论倾向：要么强调生活活动条件即外部结构性因素对生活方式的制约性，如马克思、布迪厄有关生活方式的经典理论；要么强调生活活动主体的能动性，即通过生活方式的选择建构身份认同，以齐美尔、凡勃伦、韦伯和吉登斯为代表。两大理论倾向主要差异在于“结构”与“能动”之间的侧重程度^③，其共通之处都是以抽象“人”为主体展开，少有性别视角的理论观照。而当代中国生活方式研究往往也缺乏社会性别这一变量^④。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借用社会学领域有关生活方式的“结构—能动”统合理论^⑤和社会性别视角，以 20 世纪上半叶女作家笔下对现代交往方式和闲暇消费方式的想象与再现为例，探讨在世纪之初位于中西、古今生活方式激烈对冲的历史坐标系中，男女两性的体验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不同群体的女性在现代生活方式变革中遭遇了怎样的身心经验？表现出了怎样的主体精神面貌？女性特殊的生活经验里，是否蕴藏着文化现代性发展的普遍困境抑或希望的微光，对当代的生活方式变革是否具有借鉴意义？

交往方式的变革：“社交公开”与“性别化”困境

晚清民初，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政治需要，接续了以“废缠足、开女学”为代表的女性生活方式，由此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的序幕。后经五四时期“人的发现”和“女性解放”等启蒙话语吹拂，社会交往领域明确出现了以反抗“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为任的“社交公开”“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等文明生活方式的倡导和实践。

从生活方式理论的“结构—能动”视角来看，这一波标志着现代文明进步的生活方式变革，首先是来自启蒙话语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力量引导所致，体现在社会各个层面上，有北京大学率先招收女生打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同校禁忌；一些进步社团主动邀约并提供女性自由社交的场所，其中由毛泽东发起的长沙新民学会和周恩来创办的天津觉悟社可谓这方面的表率。^⑥具有新锐思想和激进姿态的《妇女杂志》主编章锡琛，更是策划了“妇女运动号”“家庭革新号”“新性道德号”等多个专题和专号，有意识地引导社会舆论对妇女问题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讨论^⑦，使“社交公开”“自由恋爱”这些新名词开始为读者大众所知，不再视之为洪水猛兽。^⑧但在落地现实语境时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困境。

（一）“社交公开”与“平等悖论”

随着五四春雷登上文坛的女性作家，就是熏着这样的现代新风成长起来的女学生群体，她们用自己的人

① 王雅林：《社会学研究的最高使命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生活方式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

② 王雅林：《生活方式研究评述》，《社会学研究》1995 年第 4 期。

③⑤ 王帝钧、周长城：《生活方式研究的结构与能动视角——兼论生活方式研究的新进展》，《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

④ 在 2016 年中国社会学会年会上的“性别与生活：小康社会建设新视角”论坛中，有学者梳理了生活方式研究的兴起、发展史及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理论的中西比较，发现现有生活方式研究往往缺乏社会性别视角，呼吁将生活方式和社会性别交叉性视角结合起来研究。参见姜佳将、高雪玉：《性别与生活：小康社会建设新视角》，《妇女研究论丛》2016 年第 5 期。

⑥ 新民学会的 10 名领导人中，女性占了 4 名，她们积极参加学会的行动赢得了男会员“学友中诸女友，都比我们强”的赞誉，成为女界求取自由社交角色的楷模。参见周世钊：《湘江的怒吼——五四前后毛主席在湖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第 436 页。觉悟社规定发展社员和干部必须男女各一，并且以抽到的号码代替每个人的姓名来实际铲除陋习、实施男女平等。周恩来抽到五号所以叫“伍豪”，邓颖超是一号叫“逸豪”。在觉悟社的影响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也实行了“男女合室办公”。参见蒋美华：《20 世纪中国女性角色变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34—135 页。

⑦ “妇女运动号”（第九卷第一号，1923 年 1 月），“家庭革新号”（第九卷第九号，1923 年 9 月），“配偶选择号”（第九卷第十号，1923 年 10 月），“职业问题号”（第十卷第六号，1924 年 6 月），“男女理解号”（第十卷第十号，1924 年 10 月），“（第十一卷第一号，1925 年 1 月），“女学生号”（第十一卷第六号，1925 年 6 月）等。

⑧ 李晓红：《女性的声音：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年，第 82 页。

生和作品正面响应“人的解放”的召唤，公开实践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变革：冯沅君小说主人公用生命捍卫自由恋爱的权利时率先喊出若恋爱“不自由、毋宁死”的时代强音；被茅盾称作“五四的产儿”的庐隐，短短35年的生命史里，大胆率性地自主订婚又退婚、与有妇之夫勇敢结合、不幸孀居后又以当年十分罕见的姐弟恋、到日本旅行结婚等相当西化的生活方式而惊世骇俗……在这些被启蒙的知识女性对现代生活方式的选择和文学再现中，我们可以看到“结构”与“能动”统合出的强烈的新女性主体性。但是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变动时期，结构性力量显然并非只有启蒙现代性一种，尤其是对女性来说，根深蒂固的封建父权和与之配套的稳定的性别角色方式，就是另一种不容忽视的掣肘力量。在个体女性积极认同启蒙理性、大胆实践现代生活方式时，这种还没有被彻底动摇的结构性力量就会以传统文化的合法权力，对新女性实施打压或制造障碍，使得新女性们难免遭遇如子君那样“娜拉出走后”的经典悲剧，或造成庐隐笔下那些冲出封建父门却又跌入新式婚姻“换汤不换药”的夫权泥淖的苦闷彷徨。对此类新女性主体寻求与幻灭的困境，已有大量从女性意识和女性解放角度研究的不俗成果。本文更想探究的是：当启蒙话语提出“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等理想生活方式时，显然是指向普适性的、无性差的“人”的意义上的解放诉求和愿景，是启蒙理念所蕴含的平等现代性的物质体现，也确被当时的青年男女所共同向往和追求。但在五四女作家庐隐的《新的遮拦》《蓝田忏悔录》和石评梅的《林楠日记》《弃妇》等小说中却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社交公开、自由恋爱等现代生活方式是一柄双刃剑，既是男女携手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平等的突破口，也可能成为男权欺侮女性、甚或“饿鸦”一样“猎捉”占有新旧女性的便利借口。从而使旧女性被休弃有了更堂皇的理由（名曰“解放她”^①）；新女性也同样面临着“名声”受损甚至“失贞”受骗、被始乱终弃的古老陷阱^②——客观上反而巩固或加剧了两性间的不平等。

她们的这些文学想象和再现可说是触及到了生活方式相当“性别化”的特征——由于传统性别角色已被嵌入一套父权统领、男主女从等级差序格局的刻板生活方式之中，并以家庭制度和文化习俗的形式获得传承的稳定性，而“男女平等”“自由恋爱”这些由启蒙理性带来的新异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还远不足以撼动推翻整个父权性别文化体系和婚姻规制，因而对践行新生活方式的新女性来说，便意味着与父权主流规训釜底抽薪式的决裂，一旦失败，便全无退路，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娜拉出走的结局不外乎堕落或者回家（或如子君般死亡）；但对男性来说，追求自由社交并不会颠覆他的性别角色和婚姻方式，相反，自由恋爱的结果也是进入并延续这个稳定的“男主女从”的不平等婚姻秩序，故而当理论上对男女两性都是公正平等的理想生活方式，在实现了两性携手反抗封建礼教的意识形态功能之余，却在逻辑上和现实之中都存在着走向其设计反面的悖论可能。对这一吊诡之处的揭示，体现出受五四启蒙话语召唤初登文坛的女作家特有的性别敏感。她们以自己在女性生活方式变革中浸入式的经验体察，敏锐触及到了启蒙现代性这一本土化过程中的“性别化”困境。

需要追问的是，这种生活方式变革中显现出来的平等现代性的“性别化”困境，只是冯沅君、庐隐、石评梅、苏雪林这些女作家和她们笔下的五四“弄潮儿”才会遭遇的吗？在五四之光烛照不到的晦暗地带，那些没有机会上新学堂、享受社交公开的传统女性，或者虽已能瞥见新时尚的大门、却无法真正走进门内的闺秀们，她们在现代生活方式变革的风潮中，又会是怎样的命运和遭际呢？凌叔华和林徽因的作品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身影补全。

（二）性别化“惯习”与“南橘北枳”的主体尴尬

首先，在新旧交替的现实社会中，代表文明进步的新生活方式，并未带来女性的解放和幸福。凌叔华的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开篇就写了一对表姐妹之间的对话，林黛玉式的表妹婉兰先开口说“中国将男女

^① 石评梅的小说《弃妇》中，表哥结婚十年未归，恋上女学生后写信要求离婚说：“我早想解放了她，让她逃出这个毒恶凌人的囚狱”，结果是只知“依附随人”的表嫂只能服毒而亡。石评梅：《弃妇》，《妇女周刊》1925年12月，刘屏选编：《石评梅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② “多少男人，都是弃了自己的妻子，像饿鸭似的，猎捉女性。自由恋爱的招牌底，有多少可怜的怨女弃妇践踏着！同时受骗当妾的女士们也因之增加了不少……”石评梅：《弃妇》，《妇女周刊》1925年12月，刘屏选编：《石评梅文集》，第14页。

社交公开，不够程度，常常叫女子方面吃亏的……”^①，出自传统女性的这一担忧刚好印证了上文中新女性作家们所提出的那个性别化的困境有多么普遍。面对的新女性表姐却不以为然，只管批判旧式婚姻腐败到家，力劝婉兰要为自己的婚姻做主，不一会就被汽车接去赴新青年的约会了。在此，我们看到外部结构层面的生活方式变革已经搅动到传统深闺后院，新旧两位女性表现出两种不同的选择，一个悲观疑虑一个乐观自信大胆践行，貌似指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命运。然而一年后婉兰自然未能逃脱被包办婚姻无情抛弃的命运，就连开朗勇敢自如实践着“社交公开”的表姐，也被可怖的人言压死了；最后出场的三姨娘的哭诉，让读者明了在当时的社会，无论新式旧式女人都还是附属于父亲与丈夫的玩物，控诉了父权制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力量对新生活方式的钳制。

在稍后的《吃茶》和《茶会以后》等篇中，凌叔华直接描摹了男女“社交公开”中的生活细节以及对传统闺秀们的震荡与冲击。在《吃茶》中，社交活动包括了看电影、喝茶和公园音乐会等。主人公芳影自忖是个矜持之人，但“见社会潮流变了，男女都可以做朋友，觉得这风气也得学学”，可见“社交公开”这一新生活方式以流行时尚的魅力搅动了传统闺秀封闭的心。而当留学归来的同学表哥为芳影细心翻译电影中的爱情对白，公园里为她披衣、扶上车、接帽子等种种西方“绅士”行为时，让她误解为爱意表达而陷入单相思，后收到对方的结婚请柬时才大梦初醒黯然神伤。显然，中西方男女社交礼仪的文化差异，导致芳影错爱破灭。象征时髦平等开风气之先的男女交往方式，却体现出对传统中国闺秀的伤害和西方中心的傲慢。在此，凌叔华微讽的笔触十分前沿地触及了一个敏感的现代性问题：单凭生活方式的全新植入，并不能直接连带出思想观念的更新；当启蒙话语无所顾忌地援引西方文化作为思想资源，当现代性追求全盘西化而无暇顾及传统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影响以及启蒙对象的社会分层时，就有可能遭遇南辕北辙或“南橘北枳”的尴尬。正如雷蒙·威廉斯所指出的：“认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观不用改变就能移植到另一种生活方式，是没有意义的。”^②

在另一篇小说《茶会以后》，凌叔华继续聚焦这些时尚生活方式对这类半新半旧女性的冲击。小说写阿珠和阿英姐妹与一班追随新兴消费节拍的“文明男女”，参加了当时十分时兴的茶会活动后的议论和心情。从阿珠两姐妹既嘲讽又羡慕的口吻中得知，为了促进男女自由“社交”，茶会当天特意设置了一男一女形同相亲的座位安排，参加茶会的两姐妹也都心知肚明，还以不无艳羡的口吻提到“八表叔”就是经由这样的社交解决了婚姻问题。难怪当年高尔松感慨男女社交本来不是问题，但在礼教大防的中国，却成了问题。因为西方的普通社交进入中国后就变味成了庸俗的“求偶社交”。他直接批评“求偶式的社交公开简直不过是一种兽性的冲动的表现”^③。凌叔华不似高尔松那般尖刻，但显然也关注到这个问题并流露出一丝微讽。

最值得注意的是，凌叔华写阿英与茶会例行安排的男性有了交谈机会，说明外部价值观的引导和活动条件都已经具备，但阿英却说自己“最怕同男子说话”，“和男子说话，觉得很不舒服”^④，这样的自辩背后清晰可见她们依然深受“男女大防”和封建贞洁观的束缚——在长久的视两性自由交往为洪水猛兽的封建贞洁观的训诫下，若女人表现出同男子说话交往的兴趣，就会被钉上不贞乃至放荡的耻辱柱，因而需要急切撇清自辩清白。而另一边，同样受到“授受不亲”封建礼教训诫的男性，由于在两性交往过程中被建构为主动者和主导者，就完全不存在这样的困境。另一方面，这种长期的训诫也在女性的心智结构中留下了布迪厄所说的“惯习”，产生阿英真实的生理性的“不舒服”感。在布迪厄看来，生活方式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社会结构通过心智结构的内化，以“惯习”的形式对人的活动进行塑造的产物^⑤。以此看到，阿英们虽已享受到男女自由社交的现代性机会，但所受传统性别化教养塑造的“惯习”已先在地深入心智结构，且其本身就是顺从的产物，当置身于激烈转型的大时代，被新旧两种结构性力量对冲拉扯时，本来就是“无主体”或“弱主体”的她们，更是掉入两边不靠的漂浮无主状态，既无力反抗旧的又没有勇气投入新的潮流，只能躲回“空

① 凌叔华：《女儿身世太凄凉》，陈学勇编：《凌叔华文存》（上），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页。

②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256页。

③ 高尔松：《社交公开与恋爱问题》，《学生杂志》，1923年。

④ 凌叔华：《茶会以后》，《凌叔华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30页。

⑤ 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50—200页。

“虚冷涩”的屋子里感受无形的“顾虑和惧怕”。表现出凌叔华对这类女性在新生活方式变革中遭遇的性别化困境的敏锐把握和温婉同情。

无独有偶，稍晚的林徽因在小说《九十九度中》也对这类女性困境进行了思考。小说截取北京最热的一天进行横断面式的叙事，蒙太奇般切换出很多堪称时尚生活方式的画面：街面上骑着自行车快速掠过的女人丽影，代表了女性解放的运动时尚已经从画报和月份牌上走进日常生活街景；张家老太太的寿宴用上了四个现代化的冰箱；街上点心铺里卖着“卫生冰其凌，咖啡，牛乳”这样的西化饮品；另一边，在喜宴上顾盼弄姿的摩登姐妹，有着1930年代电影明星般的细眉、猩红嘴唇、花露水香味和肉色丝袜等西化流行装扮；还有“学政治法律，讲究新思想”、跳舞一流的摩登青年，谈论着流行电影；更有咖啡店里旁若无人对坐凝视、挽臂同行的文明情侣等，甚至连底层的黄包车夫都会娴熟地运用“自由平等”“文明结婚”等新名词来发议论……这一切，似乎表明当时的中国都市，西化消费以及男女社交公开、自由恋爱等新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内容了。然而，小说紧接着用当天那个婚礼的主角阿淑的内心独白，解构了这种新兴生活方式的普适性和落地效应。

“这几年对婚姻问题谁都讨论得热闹”，可她这结婚的实际，却是“让一个陌生的，异性的，异性的人坐在她家里”，点个头吃一顿饭，就“极文明的解决了”，“并没有因为她多留心报纸上，新文学上，所讨论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恋爱问题，而减少了问题”。^①在阿淑无助的困惑中，我们看到，经过了新文学和大众媒体的传播启蒙，“后五四时代”在都市生活方式层面，已形成了相当西化的风气导向和物质基础，但不幸阿淑们却缺少实现新生活方式的机会和条件。因为正如韦伯所指出的，生活方式是在“生活选择”和“生活机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前者是指人们在自己希望接受的生活方式中所作出的选择，而后者是指人们获得特定生活方式的可能性。选择起着更大的作用，但通常社会结构（主要是阶级结构、年龄、性别、种族/族群、集体、生活条件等）有可能束缚个体的生活机会，而社会化及个人经历也会影响个人的生活选择。^②

以此观照阿淑的处境，可以看到结构层面的主流意识形态借助大众媒介在大力引导传播婚姻自由的正当性，也召唤出阿淑主体意识的朦胧觉醒，让她对社交公开后的自由恋爱和平等婚姻充满了向往。但来自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结构性力量，却剥夺了她选择的“生活机会”；父权社会性别角色社会化的教养塑造——以爱的名义对女儿和女人施行的奴性训诫所形成的“惯习”，就像那厚浊深广的泥沙，将柔弱顺从这类毒素堵塞了普通女子的心智结构，使她无论内心如何不情愿都无力说不。更憋屈的是，只要她心疼体谅并用高压手段逼迫她的父母的难处，那么，貌似包办婚姻的恶名都无法成立，像五四初年冯沅君小说人物那样为自由恋爱誓死抗争的前提都被消解了。更何况她也没有可“选择”的对象，暗恋的表哥逸九倒是新青年却对她落花无意，且成年后跟他仅有的碰面也因为自己“不入时的装束”而羞惭退避——在林徽因的笔下，逸九作为“新青年”的时尚浮夸做派，隐含着的进步文明/落后蒙昧的二元价值评判导向，其本身就构成了对没有接受过启蒙教育的阿淑的压抑和嫌弃。所以，虽然社会上有李欣淑、赵五贞这样激烈反抗的榜样在先，但阿淑终究“没有勇气说什么”，只得“一鞠躬，一鞠躬地跟幸福作别”。绝望中她想起“在电影里到了这种无可奈何的时候总有一个意料不到快慰人心的解脱，不合法，特赦，恋人骑着马星夜奔波的赶到……”^③这最后的来自新兴大众媒体话语的想象性资源，对阿淑来说，却无异于空幻遥远的水中月亮，更加映衬出现实的无奈和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联系之前小说文本借逸九的口说去电影院研究什么“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等，其中隐含着的反讽意味，透露出林徽因对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思潮的质疑和批评：启蒙现代性更多停留在话语和宣传的层面，在促进生活方式从理念到物质变革的现实功能上，体现出不可回避的笼统浮泛和“落地”的苍白无力。

综上，几位女作家都以自己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交往方式变革的观察和想象，不同程度触及了五四以来

① 林徽因：《九十九度中》，《林徽因文集》，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67页。

②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03页。

③ 《林徽因文集》，第168页。

启蒙现代性的局限：有关生活方式变革中存在着鲜明的性别化差异及困境，在百年后少量的社会学实证研究中终于得到了印证^①，显示出她们以文学洞察社会问题的不凡敏锐。其次，凌叔华有关“启蒙变质”的现代性质疑、林徽因对启蒙话语落地空幻的局限，在一个世纪后的学者那里，被总结为“不可遗忘的历史教训”^②。可见女作家们身在启蒙巨流中却拥有了超越时代的敏锐眼光和前沿思考是多么难能可贵！

生活方式的变革：“具身化”启蒙与“反噬性”危机 ——翠姨为什么要求死？

如果说，女作家凌淑华和林徽因揭示了传统女性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招引却受制于父权“惯习”而陷入主体被动漂浮的困境，那么萧红写于1940年代的《小城三月》，隔了十几年的光阴回看1925年左右东北小县城里青年女性翠姨的恋爱故事时，则更进一步地揭示出传统女性被启蒙的春风唤醒后，在传统和现代两个文化空间的夹挤中窒息陨亡的悲剧根源。

小说以懵懂女学生“我”的回忆视角，构建起两个相对的空间意象：一个是连接着大城市时尚富裕开明的“我”的家：父亲伯父都参与过国民党；家族中的叔叔哥哥和女孩子都去北京哈尔滨等大城市读书；年轻人可以不分男女一起打网球、拉手逛公园看花灯、男女不分长幼合奏家庭音乐会……充满一派新式的男女平等社交自由的新气象。相比婉兰阿英阿淑们多从报纸上社会言谈间获得生活方式变革的讯息不同，翠姨受到的启蒙是“具身化”的——不仅长期住在“我”家耳濡目染，经常被真心邀请一起演奏音乐、一起游玩看花灯、打网球等活动，亲身感触到了男女平等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也对英俊而文雅的大学生“哥哥”萌发了爱意。而且与女学生“我”的亲密友情，让她详细了解到女学生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订婚后到哈尔滨采办嫁妆时，享受到西化男学生们待她如“女同学”般的绅士服务，更是切身感受到文明社交的平等美好，凸显包办婚姻的可怕，使她在对比中确立起女人应该读书的启蒙志向，并付诸努力终于争取到了上学的机会。可叹的是年已二十不被新式学堂接纳，只是勉强上了几天古板的私塾，最终失去彻底改变生活方式成为女学生的机会和信心。因为环伺着她的还有一面是依旧充斥着封建礼教的外部环境和生活方式：如“男子是不好去专访一位小姐的，这城里没有这样的风俗”^③。以及遵循包办婚姻规约的性别化的舆论氛围，也包括翠姨自己的内化认同：亲族口中对再嫁寡妇女儿卑下不洁的嫌弃，被翠姨自己内化成百转千回的自卑；还有所爱之人的迟疑懦弱；虽没高压但也并不真正关心她尊重她的长辈……总之，在两个空间的夹挤中她既没有勇气表露爱情，也没有勇气反抗包办婚姻，最终以自我毁灭的方式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可以说，在翠姨身上，启蒙现代性通过“具身化”的方式开启询唤出她的现代女性主体嫩芽，但受到父权性别意识形态和现实包办婚姻制度等外部结构性力量的制约，同时，新主体萌芽虽然释放出了一定的能动性，使她突破了矜持婉顺的好女人“惯习”，终于出声争取到了读书的机会，但启蒙理性隐含的“先进/落后”的二元价值又给了她致命一击：世纪之初石破天惊的启蒙话语，是以与传统决裂的姿态闻名于世的，主动认同、积极与传统划清界限的，就被吸纳进进步文明的正面价值系统内，反之则被价值阶梯划归为封建愚昧落后的低端^④。就像翠姨一再疑虑的那样：“是不是不读书是很坏的？”女学生“我”直截了当地回答“是的”。还有，当她恪守父权性别文化矜持贞静的规范，吃饭要三请四请才上席等传统淑女作风，在新式家庭自由民主的氛围下却显出了不合时宜的“落后”色彩，被伯父揶揄像林黛玉，而她因不识字不知这名号的出

① 用社会性别观念分析男女两性生活方式的相关数据，发现性别差异明显存在，传统的性别分工和角色期待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男女平等依然一个值得继续努力的艰难课题。沈渝：《社会性别与生活方式——基于第三期（2010年）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初步分析》，《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② 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3页。贺照田也认为五四启蒙因“空有政治抱负和观念热忱”，“缺乏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感和与普通人的连带感……而无法解决时代的实际课题”，参见贺照田：《现代中国革命与现代中国文学》，2009年在台湾成功大学演讲的录音资料，转引自“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old.cul-studies.com>。

③ 萧红：《小城三月》，《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695页。

④ 杜赞奇指出，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冲击非西方世界时，它代表的是启蒙理性最阴暗的一面。因为它在启蒙文明的名义下，把人类划分为“先进”“落后”的种族。晚清中国和非西方的其他国家一样，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了此种思想的影响。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7、122页。

处，但能分明感觉到一群读书人对她的这些符合传统的“好女人”“惯习”的不以为然和暗讽……总之，这种以进步/落后为价值取向的启蒙现代性标准，某种程度上刺激了翠姨怕被视为落后而努力挣扎的欲望和勇气，但当抗争失败没法实现生活方式的变革——成为一名真正的女学生时，那个“不读书是很坏的”启蒙观念，就成了内卷自伤的利器，让她自卑，觉得配不上所爱的大学生并认定对方和周围人都是这样看待她的。

至此，被启蒙现代性召唤出来的新女性主体幼芽，遭遇了来自父权性别观念、包办婚姻制度和启蒙话语三者的合围，以至她绝望地断了自己的所有退路和生路以求速死解脱。在此，萧红不露痕迹地点出了启蒙价值二元性中所包含的非此即彼的等级评判，带来的对启蒙对象的“反噬性”危害，即半个世纪后印度学者杜赞奇所言的“启蒙理性最阴暗的一面”。或许新文化学者最初提出一边倒的对抗传统的口号只是突破重围的一种现实策略，但因为话语观念是逻辑线性的，而新旧转型社会的现实语境又充斥着特别多重因素的攀缘混杂，因此当被启蒙之人无法做到如启蒙理想所召唤的纯粹选择时，非此即彼的二元价值评判就会把错综复杂的人性撕裂，造成无法弥合的主体矛盾冲突。翠姨就死于这样的主体撕裂中，且无以名状无从表达，以至于周围人包括互生情愫的“哥哥”也一直都没有弄懂她为什么要求死。事实上，“求死”，是翠姨身上新萌的现代主体对新生活方式无法选择的“选择”，是“能动性”的最后一个无言的悲壮的表达。

如果说阿英和阿淑们尚处在生活方式变革的主潮外围，没有自由恋爱的机会，是被解放理论和理想浪头错过和拉下的“落伍”者，那么翠姨的人生脚本就像是阿英阿淑们的续集，她已能跨入生活方式新领地，也有机会跟新青年发生恋爱的交集，但依然死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通过书写20世纪初传统女性在新的生活方式变迁中面临的爱痛生死纠结，萧红不动声色地表露了对启蒙现代性从容犀利的深度审视：既承认了时代潮流的进步文明，但也清醒地寓示了启蒙话语如寒地早春的风一样带来“解放”和“暴动”的哨音，惊醒蛰伏的种子，但太短暂和飘忽，并没有真正撼动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和封建环境。她以诗意的语言婉转表达了对启蒙话语的“反噬性危机”这个“无名”问题、以及对生活方式变革中的性别化困境的敏锐警觉。

消费方式的变革：炫耀性消费与主体空壳

如前所知，生活方式的变革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上文我们所分析的社交公开等交往方式的变革中，已然交织了消费方式变革引起的新的女性主体困境。萧红在《小城三月》里就特别敏锐地把小城的流行时尚作为贯穿全文的主线：从妇女们人手一件的枣红披肩到翠姨心心念念追寻而错失的时尚绒绳鞋，再到大耳环、高跟鞋，以及新式学堂中男学生从西装到围巾的整套西化装扮，包括他们讲自由恋爱而冷弃妻子的生活风气，等等。其中，翠姨的妹妹，被塑造为大大咧咧无脑赶时髦的反面教材，市面上流行什么就一定最快时间去买来穿上，也不管是不是适合自己，成为众人暗笑“被衣服所穿”的笑料。而翠姨对消费的态度由最初恪守父权贞静矜持的保守意识，表现出欲言又止欲爱又抑的矛盾状态，到痛失心仪的绒绳鞋后预感自己的命“不会好”的悲观迷信，再到勉强订婚后收到男方彩礼获得经济自主，终于打破了原先的过分矜持，开始呈现出报复性消费的倾向，及时穿上了最时髦的高跟鞋，戴上全城仅有的一大耳环等时尚消费品，但这种能够自由消费的选择和经验，最终也并没有让翠姨建立起如齐美尔和吉登斯所说的那种“现代身份认同”感而获得自信救赎。

而凌叔华在《茶会以后》中，精准捕捉到阿淑面对取洋名着华服、在社交方面如鱼得水的“莱利王”们，产生了深深的自卑，尤其是与佣人李妈对时髦昂贵的剜花镂空皮鞋的几番议论，更是值得进一步分析。

小说描写当李妈听到鞋价时惊叹：“唉哟，我的娘，十二块钱一双鞋，还不算好的！一双鞋够我们四个月的工钱了！”当阿珠说相当于她的“大孩子一年的工钱”时，李妈又惊呼“老天爷！”当阿英介绍“王三嫂的那双，是用了二十美金买的，合中国钱四十块呢！”，李妈忍不住大声感慨并产生了好奇艳羡的心理：“天爷爷！那鞋是怎样的？您两位小姐什么时候也带我去开开眼界？”而阿英告诉她：“人家谁让你这样一个穷婆子到茶会去？人家端茶送点心的跟班都穿着滑亮的白袍子哪。”^①

小说通过佣人李妈的三个不断递进的感叹词以及鞋价与她的薪水之间的巨大反差，加上茶会上“莱利

^① 凌叔华：《茶会以后》，《凌叔华文集》，第29页。

王”们的傲慢无视以及阿英为自己衣服陈旧而起的寒酸自卑感，再现出凡伯伦所说的“有闲”生活方式的阶级区隔功能，清晰地印证了这种“有闲”生活方式就是一种“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是特定阶级用来彰显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的手段^①。至此，我们看到这一时期传统女性面对西化生活方式的冲击时，除了父权性别钳制之外又遭遇到一个新兴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制约：消费主义价值观。在这样的价值导向中，“生活方式并不是基于人们生产的东西，而是基于他们消费的东西”，因而“文明男女”莱利王可以在阿英面前表现得高人一等傲慢无礼。与她相比，阿英只是一个钦羡的旁观者，连消费主体都还算不上，因此感受到被炫耀性消费方式所排挤的郁闷；而翠姨从开始的压抑到后来的报复性消费以及其妹的跟风消费，都折射出一个重要的讯息：对于被父权文化塑造的弱主体来说，自由消费并没有建构起她们现代人的主体身份认同。相反，以消费为乐趣、通过消费获得身份价值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与父权性别文化中有关“男人生产—女人消费”等流行谬见纽合一起，更会强化出不事生产、受人供养是天经地义的女性生活方式，使其深陷享乐陷阱而不知“人格”为何物的主体悲剧，如石评梅在《偶然来临的贵妇人》《晚宴》《红粉骷髅》等篇中所批判嘲讽的那样^②。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凌叔华的《转变》，极写转变后的宛珍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富裕西化：坐的是丝绒大沙发，穿的是玫瑰紫色绣花的细法兰绒梳妆袍子，喝的是咖啡牛奶配水果，抽的是著名的“三炮台”香烟。作者将早先顶天立地全靠自己的女权激进风格与现在的寄生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凸现新女性在现实压力下理想泯灭后堕回依附人格的可悲可叹。丁玲的《阿毛姑娘》也写了消费主义五光十色的物质时尚诱蚀了一个乡村少女淳朴健康的生命。这些作品敏锐地发现并提出警醒：生活方式的消费现代化，并不能够必然询唤出一个平等独立的现代主体人格。这既是性别化的现象，也是超越性别具有更普遍性的现代性问题。

对此，凌叔华早期作品《资本家之圣诞》就已有涉及。主人公乍看过着十分现代的生活方式：在银行工作、吸吕宋烟，家里摆着钢琴，琴上摆置镀银烛台铺印度毡子，会说洋文、参加圣诞会等，而且还会“写稿子骂政府、诋社会”，可讽刺的是，所有他骂的也正是他自己所做的：娶姨太太、追求女留学生。一生志愿家产百万，坐拥良田美宅，妻妾环绕逢迎，满脑子传宗接代，视女儿如赔钱货……凌叔华微讽的笔触揭开了这个资本家的西化生活方式只是一张现代画皮，背后藏着的是一颗极其腐朽丑陋的灵魂。再如《开瑟琳》里的伍局长太太留过洋，把孩子全取了洋名，说话一直要夹杂着英文词，每天强迫症似的要求十二三岁的儿子都穿着硬衬的西装领结在走廊下用咖啡吃早餐，即使在山里度假也不肯马虎一点，原因是不想在左右住着的外国人面前丢脸……简洁笔触活化出一个崇洋又自尊、实则怀有文化自卑的新式太太的虚荣和做作。这些作品启示我们如果没有“人”的价值启蒙和“具身”实践，哪怕消费着最前卫时髦的生活方式，也可能只是一个虚饰着现代花纹的主体空壳。

值得称道的是，凌叔华对消费与主体的关系的思考，还上升到了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双向审视。如《奶妈》里连雇来的奶妈都知道严格遵守时间、按时按点喂奶、只让孩子吃五分饱等新式育儿法，太太却觉得这新法“不合算”，因为阻隔了母子亲近的时间，“可是不好意思说出口来”^③，既从理性上认同西式育儿法的科学性，但又在感情上有所排斥。《无聊》描写一个新式妻子羡慕“人家外国人住过的地方……就像一座花园”，向佣人抱怨抨击中国人不肯花钱栽花种树，住过的房子乌烟瘴气，结果被张妈一句抢白，“人家外国人过的什么日子！中国乱，他们溜回去就得”^④而惊醒过来。既表现出凌叔华对中国文化粗陋一面的微词又对精致的西方文化的殖民性质保持了警惕，表现出相当成熟的女性主体性。

由以上的考察得知，几位女作家都语涉消费意识与父权性别规制合谋下女性消费的性别化的陷阱，最重要的是，她们笔下表现的都是传统女性弱主体在消费方式变革中所隐含的主体困境。那么对于主动认同启蒙

①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

② 石评梅把爱打扮的珠光宝气整日无所事事以消费金钱消磨光阴的贵族太太们形容为“红粉骷髅”，“醺醉在物欲的摇篮中”，批判她们“不知道人是什么？格是什么？”并提出理想的美，是“在创建高洁的人格”。石评梅：《红粉骷髅》，《石评梅选集·散文游记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年，第179—180页。

③ 凌叔华：《奶妈》，陈学勇编：《凌叔华文存》（上），第365—366页。

④ 凌叔华：《无聊》，陈学勇编：《凌叔华文存》（上），第346页。

现代性并已具有现代“人”的意识觉醒的新女性，在文化的物质层面实践新的闲暇消费方式时，又会是怎样的主体面貌呢？庐隐石评梅作品中对女性吸烟这一新的消费方式的书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观察性视野。

吸烟时尚：女性身份认同与主体改写

1920—1930年代的中国，香烟还属于舶来的奢侈品，但在新兴的报刊上，已经有非常多的香烟广告。据粗略统计，仅在《申报》上做广告的香烟公司大约就有30多家，每个公司旗下都拥有几种到几十种牌子的香烟出品，其中首推“白金龙”牌子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①所有的香烟广告试图让人们相信：男人吸烟可以振奋精神、陶冶性情、使身体健康、充满活力、家庭幸福；还可以体现身份、成名成家等；甚至抽“尚武”牌香烟可以改变中华民族“东亚病夫”的形象。

从1921年开始，众多的香烟广告画中也已出现了多种女性吸烟姿态。^②1922年7月15日，“欢迎牌”香烟广告词直接说：“窈窕淑女吸欢迎烟，则翠袖添香，为翩翩少年所欢迎。”“美丽牌”广告宣称香烟是新女性的“闺中良友”须得“顷刻不离”。“白金龙”香烟广告，暗示抽白金龙香烟是时髦的交际花的选择。^③这些广告插图占据中心位置，比文字更有力地说明，吸烟这种新的行为举止能够为女性增添魅力、并由此带来在交际场所对男性的吸引力。^④因而引得当时“闺人竟尚吸纸烟”。在公共交际场合，“可见粉白黛绿者流，十之七必以纸烟实其樱唇，恣吸若狂”。^⑤总之，广告话语中吸烟成了追求愉悦、健康和人生意义的手段，其携带的整套人生观和价值观体现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⑥，且表现出十分明显的针对男女两性截然不同的性别化导向——男人吸烟导向身体健康、孔武有力、事业有成等传统男性性别角色身份认同；女性吸烟导向性感美貌、善交际受欢迎的新女性特征，实质是顶着现代文明的华丽面纱，诱导女性甘愿成为男性欲望对象的刻板印象。

五四女作家显然也受到了这些时尚潮流的吸引，她们中不止一个自己吸烟，或在小说中频频写到女主人公吸烟的细节，其中以庐隐和石评梅最为典型。在《庐隐自传》里提到她自己的创作习惯时说：“我作文章的时候，最好是桌上放一壶好茶，一包香烟。我一面吃着烟和茶，一面就写。”^⑦在小说《搁浅的人们》中莉玲去会幼时好友，没想到她已经变成市侩而又虚荣傲慢的教授夫人，伤心失望之余只是“不响的狂吸着香烟，使浓厚的烟雾遮住她那阴沉的含泪的面容”。而《补袜子》中，主人公路侠从学校教课回来，“嘴里衔住一枝小茄利克，洒然的斜倚在沙发上”；而在以密友石评梅与高君宇的爱情故事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中，也多次写到女主人公沁珠吸烟的情景，甚至说“烟、酒现在竟成了我唯一的好朋友”，感慨吸烟喝酒已成为一种别样的“使人不忍深想的人生”。^⑧与传统闺阁女性的生活相比，知识女性可以将吸烟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无疑是带上了鲜明的现代平等色彩，但从主人公无限的感慨背后，又分明感知到这一现代生活方式并非香烟广告中吹嘘的理想人生，倒是覆着一层无奈和迷茫。沁珠的日记也直陈：“最近我学会了吸烟，没有办法时，我就拿这东西来消遣……心更陷入悲境。”^⑨庐隐的另一篇小说《归雁》中，写幼菁因强行掐灭姐弟恋嫩芽却痛苦难当时，“烟抽得可怕的多，有时一连气抽十几枝，抽到鼻管出血”^⑩，简直是到了自

① 1923年4月9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用其公司出品的香烟名称谱写了一首长长的新道情：“……驾‘飞机’，过‘长城’……‘自由钟’声声入耳。有‘美女’，性‘和平’，乘‘飞艇’，貌娉婷，……”，整首道情一共罗列了24种香烟品牌。而1920年5月到7月间，双六牌香烟在《申报》上做了一系列广告，把吸烟同人生各种各样如“娶得美妻”“看梅兰芳演戏”“坐新式汽车”“中头彩”“双生贵子”“广交际增友谊”等的快乐紧密联系在一起。参见王儒年：《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2—126页。

② 蒋美华：《20世纪中国女性角色变迁》，第138页。

③ 《申报》，1926年12月22日。

④⑥ 王儒年：《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第246、125—128页。

⑤ 刘慧英：《遭遇解放——1890—1930年代的中国女性》，北京：中央编译出版，2005年，第194页。

⑦ 庐隐：《庐隐自传》，《庐隐·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38页。

⑧ 庐隐：《象牙戒指》，《庐隐·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第334页。

⑨ 庐隐：《海滨故人》，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4页。

⑩ 萧枫编：《归雁：庐隐作品精选》，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我糟蹋和慢性“自杀”的地步，以吸烟极写女性的痛苦程度，十分类似“借酒浇愁愁更愁”的境地。从以上对女性吸烟经验的书写中，我们看到无论是真实生活还是虚构再现文本中，知识女性消费香烟无一体现出广告中那种追求享乐、体现交际魅力、增强异性吸引力的主导功能。

但有一个现象值得进一步探讨，庐隐小说频频写到女性吸烟，具明香烟牌子的很少，不过在《象牙戒指》中，却专门写沁珠在送别朋友南下的宴饮开席前，“坐在沙发上吸着长城香烟”，等到“一个西装少年和一个时装女郎”进来后，沁珠一面让烟一面开始交谈，说明吸烟已经成为当时新青年社交待客的礼节。看得出来，庐隐对此新的生活方式是顺应和欣赏的。石评梅散文《惆怅》中也有对穿着“翡翠衣服”，“坐在音乐台畔的沙发上吸着雪茄沉思”的迷人样子的钦慕和赞赏，可见石评梅也认同女性吸烟是一种西化的社交娱乐时尚，表现出对消费话语的部分顺应。重要的是，《象牙戒指》里出现的“长城牌”香烟，并不是当时广告上吹嘘的最适合女性的“美丽牌”“欢迎牌”或“哈德门”，也不是号称“最合美人之用”的“三五牌香烟”^①，而是一个竭力宣称自己是爱国的“国货”大品牌。

查阅 1920 年代的《申报》，我们看到南洋烟草公司有关长城香烟的广告，除了宣称“大长城香烟乃消闲解闷之清品”^② 的功能外，还直接把长城香烟的包装盒图案与长城图案和秦始皇的头像排列在一起，并附文字渲染“吸大长城牌香烟者，皆我国之长城也”^③，“如能提倡购吸大长城上品国货香烟的，要将爱国英雄的徽号奉赠”等^④，并且露骨地将爱国与“上等”的身份联系在一起：“高等商人皆吸大长城香烟；学堂教员也吸大长城香烟；高级军官也吸大长城香烟；大家闺秀也吸大长城香烟。大长城香烟，顶上国货，上等社会，一致欢迎。”^⑤ 这套精明的广告词可谓成功地将消费主义与启蒙话语缝合在一起，建构出爱国消费价值导向，投合了启蒙一代知识女性的家国情怀，奠下消费长城牌香烟的心理基础；其次广告明确地把“大家闺秀”和“学堂教员”捧为几大重点消费主体，让现实和文本中两者合体的知识女性产生亲切的身份认同感，夯实了她们消费长城香烟的心理倾向。但把吸烟与“上等”联系在一起，暗示了不吸长城烟就不高等的消费主义话术，体现的是“炫耀性消费”的阶级地位区隔逻辑。对这一点，知识女性们并不买账，她们在实际消费中，几乎无一是以吸烟来刻意彰显“上等”身份的，更多的是作为摆脱或逃避情感痛苦的一个新式手段而已，这是对广告背后消费主义享乐人生观和幸福观的一种直接扬弃和改写。不过这一改写还带有传统文人“借酒浇愁”式的文化心理痕迹，寓示着知识女性生活方式的变革背后还有着来自中国传统诗酒文化因子的复杂影响，因篇幅限制此处不再展开。

综上，彼时在消费领域的西化生活方式，一开始是搭载启蒙现代性的顺风车而来的，受到新文化学者的大力倡导或宽容接引，自然也带着现代文明进步的光环。也就是说，从结构性的角度看，是这两股力量的耦合推动了物质领域的生活方式变革。但西方消费方式一经在古老中国大地上着落，背后的资本主义消费意识形态便成了推动变革的最主要的结构性动能，其通过新兴的大众媒体传播建构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也表现出鲜明的“性别化”特征——这种消费话语导向的性别角色差异，正好吻合迎合了父权制男主女从的性别秩序，所以带着男女皆可的平等现代性预设的时尚生活方式背后，恰恰表现出了消费主义与父权制性别意识形态强劲合谋的一面，这与新文化学者传播期许的以现代生活方式启蒙现代“人”的主体来说，可谓南辕北辙。或许这也是启蒙现代性始料未及的困境之一吧？

结语

至此，我们借用生活方式“结构—能动”理论框架及社会性别研究视角，考察了 20 世纪初生活方式的变迁与女作家在作品中的想象与再现，发现生活方式受到三种结构性力量的重要影响：一是社会政治文化层面启蒙理性价值观的正面引导和规训，二是来自父权性别文化外在婚姻制度的压制和内在心智层面的“惯

① 《申报》，1925 年 2 月 18 日。

② 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广告，参见《申报》，1922 年 5 月 3 日。

③ 《申报》，1922 年 2 月 25 日。

④ 《申报》，1920 年 10 月 6 日。

⑤ 《申报》，1923 年 10 月 21 日。

习”固着，三是由西化的消费方式携带而来经大众传媒积极宣导的消费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这三者之间或合力或对抗的博弈，使得启蒙现代性呈现出鲜明的性别化困境和不同的女性主体能动状态。

首先，在社交公开等交往方式的变革中，新女性和传统闺秀两个群体都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性别差异带来的困境：热烈追随启蒙话语的召唤、在具身实践反封建的新生活方式中建构和表征出来的新女性主体，会与深入文化根系的性别价值、角色分工和刻板稳定的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冲突，而对男性来说，传统稳定的婚姻制度和男主女从的性别角色规范却保护并巩固了男性生活方式的顺畅延续。这一性别差异本身就潜在地含蕴着现代性平等逻辑始料未及的性别化悖论——一致对外反抗封建压迫追求平等自由的男性“同盟者”，依然有可能在两性关系中成为“压迫者”。而另一群被动进入生活方式变革的传统女性，本就是父权专制下顺从的弱主体甚至无主体的存在，即便如阿淑、翠姨曾被启蒙询唤出主体能动的微弱火星，但终被父权性别意识形态塑造的“惯习”所扑灭。表现出几位女作家对启蒙现代性局限的敏锐洞察，萧红更是含蓄而深刻地揭示了启蒙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进步/落后的价值逻辑，对被启蒙者带来的反噬性伤害这一无名问题。

其次，我们考察了两类女性在消费方式变革中的主体情态，发现彼时随着西风东渐刚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资本主义消费意识形态，作为第三种结构性力量在传统女性适应现代生活方式过程中的重要影响，揭示了代表文明进步的消费方式本身并不必然能带来现代人的主体意识，反而容易掉入享乐主义价值观相伴的炫耀性消费、主体消弭的陷阱。而新女性群体在吸烟这一新的消费方式中，由于经历了“人”的观念启蒙和性别解放的具身实践，具备了独立平等的现代性别主体意识，更能清醒识别并跳出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笼络蛊惑，勘破了消费意识形态物化女性的刻板身份认同，也成功拆解、改写了资本主义炫耀性消费带来的阶级不平等话语，表现出对传统文化和西式生活方式的双向审视的可贵理性。也昭示了只有在培育“全人”的主体前提下，生活方式的变革或许才有可能打破性别化的差异困境，成为通向人的解放的一束希望微光。

百年前女作家们的文学想象，已然提出了被当代生活方式理论依旧忽略的性别差异与主体认同问题，表现出文学回应社会问题的独到敏锐，在当今仍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化强国背景下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研究”（21&ZD060）子课题三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张曦）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festyles and the Gendered Dilemma of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 A Study Centered on Ling Shuhua, Lu Yin, and Xiao Hong

JIANG Yunfei, ZHANG Zhihui

Abstract: The May 4th New Literature can be regarded as a byproduct of the drastic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lifestyles, yet literary research has paid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lifestyle. Drawing on the “structure-agency” integrated theory of lifestyl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odern female lifestyles represented in the works of women writers such as Lu Yin, Ling Shuhua, and Xiao Hong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It reveals that these writers addressed issues such as the “gendered dilemma”, the “backlash crisis”, and the distortion of enlightenment in the process of localizing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Their works demonstrate that Westernized lifestyles, which were then glorified as symbols of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failed to fulfill th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spiration of cultivating modern “personality”. Instead, the consumerist-hedonist ideology behind these lifestyles, in collusion with patriarchy, led to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reinforced class inequalities, and resulted in the subject eliminatio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s of these women writers a century ago already raised the issue of gender differences, which remains overlooked in contemporary lifestyle theories, showcasing literature’s unique sensitivity in responding to social problems.

Key words: lifestyle,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gendered dilemma, consumerist ideology